

· 台湾丛书 ·



张我军选集

.2

张光正 编

时事出版社

张我军选集

张光正 编

样书

时事出版社

1985年

张我军选集

张光正 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河北涿县范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57,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统一书号: 10225·015 社科新书目: 136—114

定价: 1.8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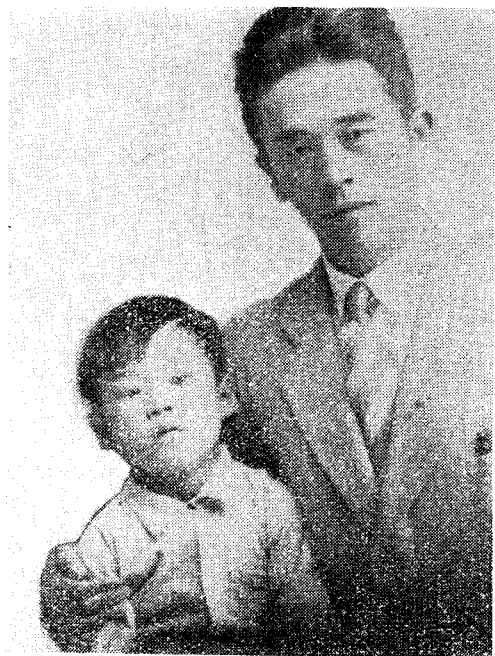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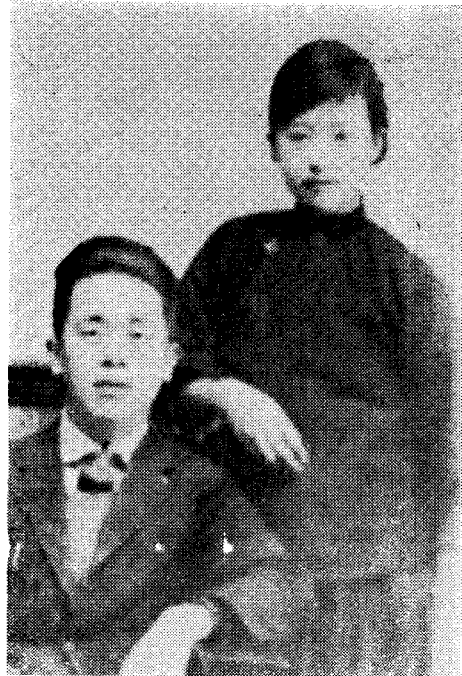
出版前言

台湾省籍文学家张我军先生，早在1955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市。为纪念他逝世三十周年的到来，本社出版了张先生的哲嗣张光正同志编辑的这本选集，为研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同志提供可贵的资料。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也将有益于促进台湾海峡两岸对文史研究方面的交流。

时事出版社编辑部

1985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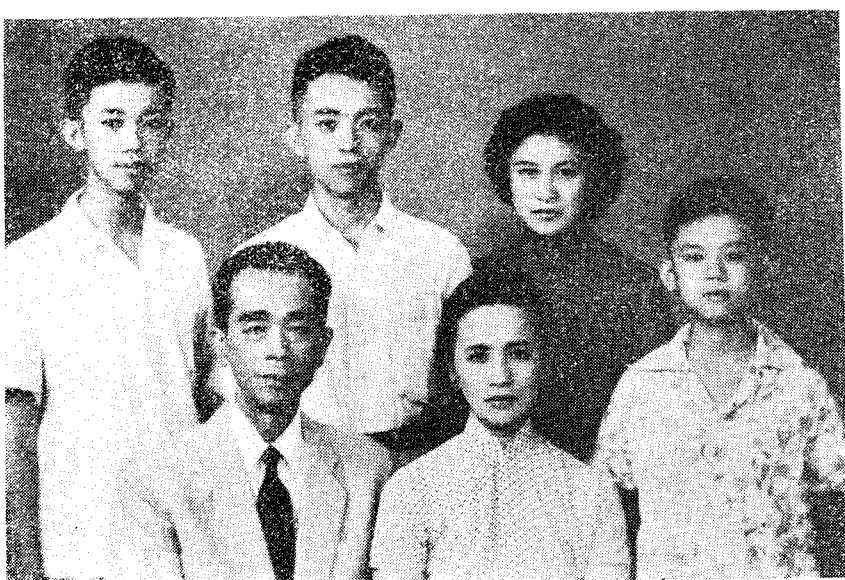
二十年代《乱都之恋》时期的张我军及夫人罗心乡。



三十年代张我军及长子（编者）合影。



四十年代张我军，罗心乡在北京故居前合影。



五十年代张我军逝世前五十天在台北同家人合影。后立左起第一人为三子光诚；第二人为次子光直。右起第一人为四子光朴。

张我军晚年遗作“春雷”手稿。

被称为“台湾新文学革命发难檄文”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



鲁迅先生1926年8月11日
日记手迹。



张我军1926年8月11日赠给鲁迅先生的四份《台湾民报》（现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目 录

一、台湾新文学运动时期论评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1924年4月6日)	(1)
糟糕的台湾文学界 (1924年11月21日)	(4)
欢送辜博士 (1924年11月23日)	(8)
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 (1924年12月11日)	(11)
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 (1924年12月5日)	(14)
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 (1924年12月4日)	(21)
揭破闷葫芦 (1925年1月6日)	(25)
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办法 (1925年1月14日)	(30)
复郑军我书 (1925年2月3日)	(34)
文学革命运动以来 (1925年2月21日)	(37)
诗体的解放 (1925年3月1日至3月21日)	(39)
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 (1925年3月4日)	(49)
生命在, 什么事做不成? (1925年3月16日)	(52)
孙中山先生吊词 (1925年3月26日)	(56)
新文学运动的意义 (1925年7月28日)	(60)

中国国语文作法（一名白话文作法）导言

（1925年10月25日）……………（ 66 ）

文艺上的诸主义

（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 69 ）

随感录（九篇）

（1925年1月至1926年2月）……………（ 82 ）

二、文学创作

沉寂（1924年3月25日）……………（ 103 ）

对月狂歌（1924年3月25日）……………（ 104 ）

无情的雨（1924年6月16日）……………（ 105 ）

游中山公园杂诗（1924年8月8日）……………（ 108 ）

烦闷（1924年10月4日）……………（ 110 ）

春意（1925年3月）……………（ 112 ）

弱者的悲鸣（1925年7月）……………（ 113 ）

《乱都之恋》的序文（1925年12月）……………（ 114 ）

南游印象记（1926年1月）……………（ 115 ）

《弱小民族的悲哀》译者附记

（1926年7月7日）……………（ 125 ）

买彩票（1926年9月6日）……………（ 126 ）

《卖淫妇》作者小传（1929年9月8日）……………（ 135 ）

秋在古都（1939年8月5日）……………（ 137 ）

病房杂记（1940年3月至5月）……………（ 142 ）

《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

（1943年7月12日）……………（ 154 ）

《黎明》原著者序、译者附记及译者的话	
(1944年2月2日)	(161)
元旦的一场小风波 (1944年12月22日)	(165)
当铺颂 (1947年11月23日)	(168)
山歌十首 (1948年10月1日)	(172)
采茶风景偶写 (1948年6月3日)	(180)
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 (1948年8月)	(185)
埔里之行 (1949年1月)	(190)
春雷 (1951年4月)	(196)
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 (1952年1月)	(200)
附：张我军著译书目和篇目	(216)
编者后记	(220)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最敬爱的青年诸君！

我这几年在海外奔波，所以没有工夫和诸君一块做事，甚至和诸君说话的机会也绝无，这是多么遗憾的事！但是我自好久好久以前就想对诸君说几句很重要（照我的意思是很重要的）的话，但只是找不出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忍之又忍，到如今已忍无可忍了，因此抽了些时间来和诸君商量商量。自从世界动乱以来，往日的文明已宣告破产，而各种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等等方在萌芽之时，诸君也根据民族自决与其他的理由，做了种种运动，提出种种的要求，想把台湾的社会也使其经过一番的改造。当时诸君未尝不勇敢酣战，然而诸君的运动经了一挫再挫，有的人已是丢盔舍甲而逃，有的虽还站在那里呐喊助战，但是心中却已是吓得半点的气力也没有了。当日参加运动的人，演了这幕悲戏，后来再要参加的人，胆子也就寒了。所以运动的势力，日见衰微，到现在不但未曾收效，且受了许多许多的困苦。这是因为有一种最厉害的武器，诸君不肯拿上战场。这武器是什么？团结、毅力、牺牲三者而已。舍此而言运动改造，无异与虎谋皮！

其实我们所处的社会是老早就应该改造的，但换了汤而不曾换药，所以我们今日仍处在不合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与其要坐而待毙，不若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倒还干净的很。况且今日

要改造社会，实有充分的可能性！

所谓改造社会，不外乎求众人的自由和幸福，而这自由和幸福是要由众人自己挣得的，才是真正而确固的，决不会从天外飞来，或是由他人送来的。犹如面包是劳动者额上流了汗才能得来的。舍着这条大路不走，终日只在神前祈祷，或是在路上叫讨，哪一个肯大发慈悲给你吃一顿饱？马克思甚至说：“人类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事迹。”^①，所以处今日的社会，老实不能学那上古时代的愚民的“不知不识，顺帝之则”了。因为你若这样说，谁给你自由和幸福？

敬爱的青年诸君呀！那些不良老年们我是不敢承其抬举了。最少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地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一日！

然而诸君呵！诸君除几位极少数的人，还在那里一息奄奄请愿议会设置之外，其他莫说改造社会的运动连个影子也没有，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进路也都已经走错了。诸君以为议会设置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社会的一切也就无从改造了，就自暴自弃的不独不与那些勇敢的兄弟们相助，或另向一方面开始活动，尚且站开在远远地望着他们嘲笑，有的甚至眩于利诱，要来陷害他们。唉，青年诸君呀！难道诸君对于现社会能够满足吗？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益的争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或是要“乐夫天命”学陶潜的遁世者流吗？或是同情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吗？不然诸君怎的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合解的奴

^① 马克思这句话见于《共产党宣言》，现在的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台湾的诗文等从没见过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滚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滚得一身臭粪。）想出出风头，竟然自称诗翁、诗伯，闹个不休。这是什么现象呢？不瞒诸君说，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机，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因为不备于平时，一旦事临，实有不知所措的。所以我很希望诸君，第一要培养实力，而改造社会的念头不可一日飞去。而且能够利用我前面所说的三件——团结、毅力、牺牲。那末即使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改造于今日，总也不会使其爆碎，而自由和幸福不怕得不着了！直言恕罪，敬祝诸君的
进步！

1924年4月6日

（原载《台湾民报》二卷七号，1924年4月21日）

糟糕的台湾文学界

这几年台湾的文学界要算是热闹极了！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的盛况。试看各地诗会之多，诗翁、诗伯也到处皆是，一般人对于文学也兴致勃勃。这实在是可羨可喜的现象。那末我们也应能从此看出许多的好作品，而且乘此时机，弄出几个天才来为我们的文学界争光，也是应该的。如此才不负这种盛况，方不负我们的期望，而暗淡的文学史也许能借此留下一点光明。然而创诗会的尽管创，做诗的尽管做，一般人之于文学尽管有兴味，而不但没有产出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我们于是禁不住要出来叫嚷一声了。

自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起于欧洲以来，西洋的文学焕然一新，迥非昔日可比。自古典主义而浪漫主义，自浪漫主义而自然主义，到现在，自然主义的时运也已去了，所谓新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已布满了全世界的文坛了。就是文化落后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跟政治运动之踵，文学革新运动也蹶起了。明治、大正的文坛上，出了不少的战士，站在睡眼朦胧的文坛上雄呼疾叫不遗余力，现在他们的成绩显著，差不多已不让欧美独擅其长了。而且社会上、政治上乱麻似的中国也已经过了一翻新生命的洗礼了，所以现在中国的新文学，也大有可观了。总之，现在的时

代，无论什么都以世界为目标，如政治、如外交、如经济等等都是世界的，文学也不能除外，所以现代的文学，已渐趋于一致，而世界的文学的成立，也就在眼前了。然而，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垄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

象台湾那般小小的岛，而且幼稚的文学界，不知自行革新也罢了。但这几十年来，日本文学界猛战的炮声，和这七、八年来中国文学界的战士的怒吼，都不能打动这挟在其间的小岛，欲说其是已麻木也太可怜了！我们台湾的人，识两国文学（日本和中国）的那么多，况且此两国都是最近的师表，正可借此来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而事实却不如此，一般斯文气满面的文士，只顾贪他们的旧梦，不思奋起也来革新一下，致使我文学界还是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些活气，与现代的世界的文坛如隔在另一个世界似的，这是多么可痛的事呵！

我们不是好高骛远趋新弃旧之徒，人喜欢我也喜欢，人厌弃我也厌弃。但事实上象古典主义（如台湾现在的文学）之当废，已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了，不容余喙的真理了，如地球是圆的，人是要死的一样的真理了。

他们不但不能脱却旧文学的迷梦，踏入新文学的路上，而懂得文学是甚么的人，恐怕也百中不能求一，（照这样结论起来，他们死守古典主义也难怪的。老实说一句，他们或许不自知其是守在古典主义罢。）试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诗？诗是什么？（我所以拿诗来做例者，是现在历来也许都是如此——台湾的文学，除诗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种的文

学了。如小说、戏曲等不曾看见，所以现在台湾差不多诗就是文学，文学就是诗了，所以拿诗来做例，以下都是如此。）那么是同问着哑巴一样的了。（也许有不少很有研究的人，但这是拿大多数来说的。）所以他们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里闹脾气，诌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①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

还有一班最可恨的，把这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而且自以为儒文典雅。其实这种器具得来的名利，与用金钱得来的有何分别？实在比用金钱做器具的老实人更可鄙可恨的！

至于最可怜的是一班活泼泼的青年，被这种恶习所迷，遂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他们以为做诗易于得名（其实这算什么名），又不费气力（其实诗是不象他们想的那么容易的），时又有总督大人的赐茶、请做诗，时又有诗社来请吃酒做诗。既能印名于报上，又时或有赏赠之品，于是不顾死活，只管闹做诗（其实是胡闹）。他们腹内半部唐诗合解也没有，只管搜尽枯肠，一味的吐，几乎把肠肚都吐出来。用尽心血，耗尽宝贵的光阴，其结果博得一个不知是好名还是臭名。几年之间，弄不出一句半句的好文字，却满腹牢骚，满口书臭，出言不是“王粲蹉跎”便是“书剑漂零”，到底成何体统？文学的殿堂，一定是不容这班人踏入的呵！

① “总督阁下”及下文的“总督大人”，指当时日本派驻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本文所指是第十位总督伊泽多喜男，亦即本集《随感录》中之“伊泽总督”。